

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施添福著。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中華民國76年出版，210頁。

施添福先生這本專著，雖僅兩百頁左右，但主題明確，理路清晰，值得一讀。他的目的很單純，在於找出影響臺灣地區人口籍別分布的因素。他先駁斥以來臺先後以及分籍械鬥解釋籍別分布的看法，再以泉、漳和粵人在臺集居地與其原鄉地理環境和生活方式的契合作為理解的關鍵因素。從來臺先後或分籍械鬥著眼，是立基於優勢羣體和劣勢羣體的抗爭和對立的過程。從地理環境或生活方式著眼，則籍羣分布完全是自願選擇的結果，是原鄉文化的反映。這樣的爭論是有其理論意義的。

作者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分別鉤勒清朝與日據時期籍別羣分布的狀況。他根據清朝的文獻資料，指出漳泉移民一向選擇沿海平原或平原內緣近山一帶，而泉人更是偏好海口或海岸地區。而粵籍移民則大都選擇近山的平原、臺地或丘陵，很少選擇濱海一帶。有清一代，雖然漳、泉與粵籍移民在島內的分布有所變動，大部分是南北位置的轉移，而少見山海之間的變動。

利用日據時代的「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調查資料」，以253個街莊級行政區為分析單位，呈現籍別羣在全島分布的全貌。他將各街莊分成泉、漳或粵籍優佔區，同時依距海的遠近，將各街莊分成0至5六個類別，數字越大距海越遠。利用此兩項分類進行交叉分析，並以卡方檢定統計顯著性。這樣的分析使我們具體看到，不同籍別羣的優佔區的確有著顯著的差距。作者結論說，泉人主要集中於海岸一帶，漳州人和客家人居於內陸地區，而客家人比漳州人的分布更偏向內陸。作者又以竹塹地區的大字單位進行分析，閩、客隔離，閩人偏居海岸地區的現象也同樣出現。作者認為清代與日據時期籍別羣的分布並無基本的差別，所謂山海的分布特性，並非隨機的，應該進一步探究其原因。

作者首先批駁來臺先後的說法。他的理由是：第一、明鄭時與施琅征臺時，雖以漳泉人為多，但當時移入人口甚少，無助於了解日後全島漢人祖籍羣分布的情形。第二、康熙海禁時期，雖有禁潮、惠人前來之令，但當時大部分地區尚處於未開發狀態，粵籍移民即使遲至康熙末年來臺，仍有充分的選擇機會。第三、偷渡是早期漢人來臺的主要方式，各籍人都有同等的機會。第四、官田、官莊大都為漳泉人所佔有，漳泉人比起同一時期的客家

人，發展的機會較佳，且粵人大都為佃丁，採季節性或週期性的移墾方式，如此導致客籍移民未能在嘉南平原建立家園，但這不是來臺先後的結果，而是受到政治勢力與移墾形式的影響。

作者就文獻資料的分析，也排除了械鬥的影響。他認為，許多地方所顯現的只是交換性的地區調整而已，其結果不過使分籍別地而居的型態，更趨凸顯和集中而已。少數發生根本變動的地區，從遷徙的方向來看，亦僅屬同質交換而已。粵人由沿山地帶遷至沿山地帶，泉人也未因械鬥而被迫由海遷至內陸。作者於是推論道，遠在分籍械鬥大盛以前，各籍羣居山居海的性質，早就形成了。

作者在批駁兩種說法之後，則就各籍原鄉地的歷史發展以及在清初的社會經濟特徵，認為因應各原鄉地所塑造成的生活方式才是決定臺灣籍羣分布的真正原因。「像安溪這個遠離海洋而位居羣山之間的縣份，入清之後整個社會都充滿著商業氣息；則泉州府其他四個瀕海的縣份，在明末清初時，其逐末風氣之盛，即普遍過著以行賈、洋販、工匠、漁撈、養殖、曬鹽為主義的生活方式，應該是不難理解的。挾此逐末意識的泉州人，當梯山航海，冒渡橫洋來到臺灣之後，優先選擇海口地區置航販洋、設舖行賈及起厝務工，或選擇沿海一帶築塢養殖、開埕晒鹽及出海捕魚，以遂其逐末之志，也應該是了解的。」

漳州府雖有以月港為中心建立的海洋生活方式，但影響不及泉州府之廣，逐末之風亦遜色甚多，比起泉州府更依賴農業以紓解明中葉以後日增的人口壓力。「漳籍移民中，大部分定居於適合經營農業的西部內陸平原地區，而小部分居於適合發展海上事業的海口及沿海地帶，也就不足為怪了。」

「客籍的原鄉是個山鄉，自明到清，客民在這個山鄉，一直過著純粹的農耕生活方式。他們不但擅長河谷平原、丘陵地和山地的農耕技能，同時也養成團結互助和知足常樂的生活態度。……冒渡橫洋來到臺灣之後，其優先選擇適合發展此一生活經驗的平原、丘陵地或山地居住，應該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即使先移到海口，也只是暫時的，終究會遷往類似他們原鄉的地區，再造農墾的生活。

作者從籍別羣分布現象的界定，駁斥既有的看法，再描述原鄉地的地理環境與社會經濟狀況，以支持他自己的論點，一步步向其中心論題逼近，邏輯層次分明，整體論述結構甚是嚴謹。就清初以前的史料檢證原鄉與在臺居地相似性的作法，在目前臺灣史的研究之中，極為少見，當我們在探討臺灣

發展的特殊性時，與原鄉比較之後才下論斷，是不容忽視的。施先生的專著，可以說是這種研究取向的一個範例。但是，施先生的論點還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得指出有關漢籍移民分布統計分析上的一個問題。施先生的推論是，客籍優佔區中距海一個單位和二個單位的遠高於漳州優佔區者，距三個單位以上的，客家優佔區即逐漸減少，就此即足夠說明客家人在內陸集中分布的程度比漳州人更為顯著。但從書中的表 3-3，我們發現，漳州優佔區中距海三個單位以上的行政區佔了將近50%，而客家優佔區中才不到18%。再以平均數來看，各優佔區距海的平均數，泉州是0.97，客家是1.69，而漳州是2.29。泉籍偏向海邊是可以肯定的，但作者有關漳籍與客籍的論斷是有違事實的。這可能是漳籍優佔區所在的中、南部，向內延伸的腹地較廣，而位於高屏與竹塹的客籍優佔區因高山阻隔，缺少向內再深入地帶。但作者並未從這方面去思考。

作者主要是採類比的推論。在駁斥了兩種既存的想法之後，他就陳述三籍人羣原鄉地的地理環境和生活方式，完全以原居地與在臺居地的類似性作為推論的基礎。而在臺居地則是在日據時期才非常具體地陳現給讀者。如此的推論需要更細緻的分析才能讓讀者完全信服。第一、各原鄉地的內部差異是否也可反映到移居地？譬如漳州人在臺居地靠海的是否大都是月港所在縣份之人？安溪靠山，安溪人的在臺居地是否異於其他的泉州府人？第二、早期移民是否主觀就有尋找類似原鄉環境的企圖？第三、從清以至日據時代的變化過程的確可以追尋類似原鄉環境來說明？

就第一和第二點作者並未進行任何的討論。特別是書中有關早期移民的一些例子，並不支持第二點的說法。作者認為漳、泉與客籍人士在清初都到嘉南平原從事農耕，就此反駁來臺先後的說法。但後來客籍人士轉往下淡水和東港兩流域。依施先生自己的推論，這是漳泉人的政治優勢與客籍人士的移墾形態（即多為季節工）所導致的結果。這樣的推論並不支持原鄉生活的命題。

作者落墨最多者，是有關清代籍別羣分布的變化方向，特別是在第六章有關分籍械鬥對祖籍分布影響的討論之中。筆者最感困惑的是，泉、漳與客籍混居地帶以及大量集中地帶在清代的變化如何？是否在清代前期混居地帶各籍人口數便已經少於集中地帶？更淺顯的說，即居住在像新竹那樣客籍佔優地帶的客籍人口數是否多於閩粵混居地帶的客籍人口數？在這方面比較明

確的認定，才能讓我們評估施先生有關「交換性的地區調整」的說法。我們不否認，在臺中縣以至於桃園縣的某些地帶，很早已經有著大量客籍人口的聚集，但如果當時海居地帶的客籍人口多於客籍集中地帶的客籍人口時，我們就不能忽略分籍械鬥對日後閩客隔離的影響作用。

其次械鬥就算造成「同質」地區的交換，但為何客籍人士特別集中於臺灣的某些地區，也不是由原鄉生活方式所完全決定的，桃園地區北閩南客的分化，似乎也不是地理環境懸殊的結果。要相當明確勾勒出清代以前籍別羣的分布狀況，並不容易，施先生並未重建出清晰的影像。在這種情況下，若將臺灣籍別羣的分布視為原鄉生活方式與籍別羣抗爭對立二者互動的結果，可能比較周延。施先生太偏向於單一因素的決定了。以東南亞華僑的分布而言，原鄉生活方式似乎根本用不上力。但早期便有人自願前往類似原鄉的地方開墾，以及在族羣對立之際，這些地方成為吸引同籍人羣，是可以接受的。這是施先生所帶引我們的一個思考方向。

□章英華□